

1688年，路易十四寫下一封信

中國的康乾盛世，被西方傳統學界稱之為「High Qing」時代，此時的法國也正處於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說起太陽王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似乎很難把這兩個人聯繫到一起，然而正是這兩位君主的促動，遠隔千山萬水的兩大文明中心開始碰撞出交會的火花。

和許多美好的故事一樣，這段關係緣起於一封信。那是1688年的盛夏，路易十四在馬利城堡的書桌前鄭重寫下這封信，信的收件人是他素未謀面的、遠在萬里之外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他在信中稱康熙為「最親愛的朋友」，他說他已派遣六位數學家「為陛下帶來我們巴黎城內著名的皇家科學院中最新奇的科學和天文觀察新知」。此時這六位數學家中的五位（張誠、白晉、李明、洪若瀚、劉應）已經攜帶著約30箱科學儀器和精美禮物抵達中國，正式搭建起早期中法兩國文化交往的橋樑。

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治好康熙的瘧疾

這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清政府對他們的稱呼）是來自耶穌會的傳教士。他們為皇帝講授天文、數學、人體解剖、哲學等知識，將科學著作翻譯成漢語和滿文，甚至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瘧疾。

康熙以極大熱忱向傳教士們學習近代科學且很快領悟，在五個月的時間裡就掌握了幾何學原理，並仿照路易十四科學研究院在紫禁城裡建立起繪畫、雕刻、雕塑以及製作鐘錶和其他計算工具的「科學院」。出於對幾位耶穌會士的器重，康熙還委以國家事務，中國的第一張全國地圖《皇輿全圖》就是在他們的幫助下繪製，張誠甚至還參與了《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並多次陪同康熙皇帝出使談判。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學習中國的思想文化，用腳步丈量土地，他們的見聞以書信等方式跨越山海在歐洲傳播，法國貴族們藉此來瞭解中國這個不一樣的世界。

17世紀的法國人對中國政府與皇帝有著強烈的好奇心，沉迷於傳教士們對強大的東方統治者的描繪，法國博草皇家手工工廠受這些見聞啟發，製作出一整套關於「中國皇帝

的掛毯，具象化了對遠東君主的想像與崇拜。此系列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作品擁有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和物品，印證了彼時通過傳教士建立起的中西方天文科技的交流。儘管這件掛毯繪製的無疑是一幅想像中的情景，但這種奇幻古怪的趣味恰恰是對那個時代法國人理解的「中國風」最忠實的反饋。

1693年，康熙令白晉以「欽差」的身份回法國招募更多傳教士赴華，白晉向路易十四呈了十餘萬字描述康熙皇帝的報告（即後來出版的《康熙帝傳》），並為法國國王帶去了珍貴禮物和包括《易經》《本草綱目》在內的40餘卷漢文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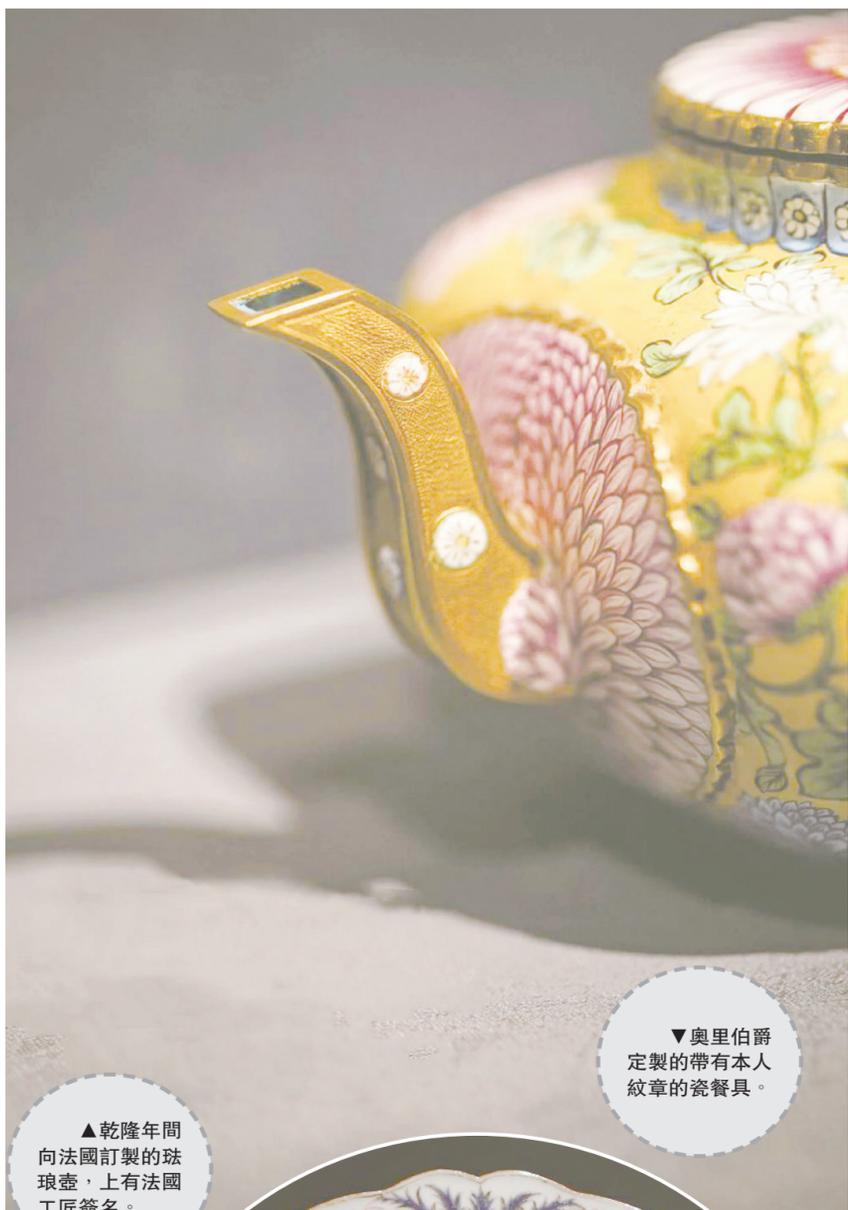
白晉在法期間對中國文化的宣講引起巨大反響，吸引了100餘名傳教士相繼赴華。傳教士們在中國留下大量科學儀器和各類書籍，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貢獻。

在「國王的數學家」的幫助下，兩位君主對彼此都有了充分的瞭解，兩國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耶穌會士對中國的推介讓路易十四深深喜愛上了中國藝術，在他的影響下「中國風」開始風靡歐洲。



◀歐蒙公爵舊藏花園瓷凳亦由中國瓷繡墩改製而成。

▼清宮舊藏銅鍍金開光人物像懷表。



▼奧里伯爵定製的帶有本人紋章的瓷餐具。

▲乾隆年間向法國訂製的珠琅壺，上有法國工匠簽名。



「中國風」伴隨歐洲文化藝術成長

「我們以歐洲而論，沒有哪一家名門貴族的古老程度能比得上中國的那些世家」，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18世紀下半葉歐洲對中國最崇高的致敬。

「中國風」一詞緣起於法國，是東西文化與想像力交融的產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伴隨著歐洲文化藝術的成長。17、18世紀之交的新年化裝舞會上，路易十四身著中式服裝乘坐中式轎輦登場，將這股中國風的浪潮推向新高。路易十五的財政總監維尼奧裡伯爵十分熱愛中國的瓷器與藝術，密切關注法屬東印度公司商業活動的拓展，積極鼓勵其與中國開展貿易，1700年法屬東印度公司的高船第一次在中國登陸。通過東印度公司，他訂購收藏了許多中國瓷，甚至有帶有本人紋章的整套瓷餐具。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東印度公司為法國王公貴族帶去大量中國製品，除了瓷器，他們對絲織品格外青睞。18世紀時，中國進口的折扇極受上流社會女性的歡迎，她們用它來搭配宮廷服飾，幾乎所有貴族女性都有一幅手執折扇的肖像畫。

另一位為兩國友好往來作傑出貢獻的是路易十五和十六時的國務大臣亨利·萊昂納爾·貝爾坦，他代表國王向乾隆皇帝贈送禮物，長期與在華耶穌會士保持聯繫。中國迷貝爾坦關注中國的科學與生產，匯集出版關於中國的文獻資料，讓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更加全面真實，他的收藏遠非「花瓶式的中國風」，涵蓋瓷器、漆器、樂器、服飾、書籍畫冊乃至珠寶錢幣等方方面面。

毫無疑問，令中式審美深入法國宮廷貴族人心中的重要載體是瓷器。路易十四時代大量的中國瓷器便進入法國宮殿，包括國王、王太子在內的一眾貴族都是中國瓷的收藏大家。這種狂熱從繪畫中亦有體現，在法國的

肖像和靜物畫中時能見到中國瓷器的身影。

正是風行於法國宮廷對中國瓷器的迷戀，法國人開始如癡如醉地研究製瓷工藝的祕密，經過上百年的探索，塞弗爾瓷器工廠終於利用高嶺土成功生產出了硬瓷。在酷愛中國瓷器的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情人）的大力扶持下，塞弗爾一躍成為生產法國王室御瓷的御窯。擁有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支持的塞弗爾取得的一個巨大成功，即燒製出了一種獨特的粉色瓷器，一經推出就非常受藏家和鑒賞家的歡迎，與當時流行的洛可可風格十分相配，深得「洛可可教母」蓬巴杜夫人的喜愛。隨著這股粉色熱潮的席捲，久而久之這種顏色被稱為「蓬巴杜玫瑰粉」。有趣的是，從清宮舊藏和檔案資料中發現，塞弗爾粉瓷被當成禮物送給了中國皇帝，反過來影響了中國瓷器的審美取向。

伴隨著法國鑲金工藝和洛可可風尚的發展，為了讓瓷器更顯典雅高貴，法國人開始流行為瓷器加上鑲金青銅的底座和把手，這種鑲瓷器物似乎更符合法國貴族的品位，知名的青釉香水瓶就是這一風尚的代表作。

收藏與仿製並不能滿足法國人對中國風的狂熱追求，這一時期王室貴族通過裝飾自己的主題房間甚至建造中式建築來彰顯自己的品位。1670年，孟德斯潘夫人（路易十四情人）建造了特里亞農宮，坐落於凡爾賽宮花園的宮殿正如其名，外牆使用了仿製青花瓷的藍白彩陶，開創了歐洲仿中式建築的時代風潮。1761年，路易十五的王后瑪麗·萊什琴斯卡定製了八幅描繪中國茶葉種植和貿易的巨幅油畫裝飾在她的房間內，配以珍稀瓷器、大理石花紋漆傢俱和中國壁紙，至此這間被稱為「中國人廳」的主題房間成為凡爾賽宮中國風格的代表。

「西洋風」在中國多領域孕育新風貌

當「中國狂熱」席捲歐洲時，法蘭西的風也吹到了紫禁城。在清代宮廷中，來自法國的豐富收藏見證了中法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這些物品有的是法國宮廷的禮物，有的來自傳教士的進獻，有些則來自兩國的貿易甚至清廷的定製。這股「西洋風」最終成為清宮藝術與科技文化發展的靈感，催生了中國繪畫、鐘錶、玻璃、珠琅等領域的新風貌。

首先吸引皇帝目光的是西洋畫。耶穌會士帶來的西洋畫與注重「寫意」的中國畫迥乎不同，白晉描述康熙見到西洋畫時的情景：他「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它，彷彿這幅色彩自然鮮艷的肖像在他眼前活生生地再現了他聽我們說過的我們尊嚴的君主的一切奇跡」。於是皇帝要求善畫的傳教士留在宮中任職，並將西洋繪畫技法傳授給中國畫師。

於是，西洋繪畫的素描手法、明暗寫實、焦點透視法（在清宮稱為「線法畫」）乃至西方銅版畫的技法都為中國傳統繪畫注入新的血液，紀實題材的畫作開始繁榮，西洋畫師與中國畫師切磋技藝，留下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作品。在他們的筆下，連皇帝都走下肅穆莊嚴的高台，戴上假髮穿上洋裝玩起角色扮演。

西洋鐘錶以其奇巧精美頗受皇帝的喜愛，因進貢的鐘錶數量有限，康熙皇帝命清宮造辦處下設自鳴鐘處，於是鐘錶開始進入自主生產的階段。自鳴鐘處的鐘錶製造仍由傳教士們負責，為了製造出高水準的御製鐘錶，自鳴鐘處不僅購置許多先進設備，更從中國各地召集能工巧匠任職。

由於鐘錶、科學儀器等器物的製作均需配有光學玻璃，隸屬於養心殿造辦處的御用玻璃廠於康熙三十五年成立。除了用於科學器物的玻璃，在法國耶穌會士的主導下，玻璃廠生產出套色玻璃、灑金玻璃、刻花玻璃、

平板玻璃、畫珠琅玻璃等品類。

18世紀中國瓷器迎來全面繁榮，與此同時畫珠琅工藝也逐漸成熟並走上巔峰。珠琅是一種附著在金屬製品表面的玻璃質材料，所謂畫珠琅，即是在表面燒結白色珠琅釉的金屬製品上繪飾各色珠琅釉料，最後焙燒成型的工藝。這一技法源於西方，法國乃個中翹楚，因康熙皇帝的欣賞，清廷不僅向法國定製珠琅器，還從法國邀請珠琅匠師將這一工藝引入中國並設立珠琅作。隨著畫珠琅技藝研究的深入，中國不僅自主研製了20餘種珠琅色釉，更經歷了從銅胎、玻璃胎到瓷胎的創新過程，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廣州因進口西洋珠琅器就地設廠研製洋瓷，在向法國定製清宮畫珠琅器物時受到啟發，開啟廣式透明珠琅的輝煌發展史。

乾隆時，皇帝下旨整理康熙朝以來歷代畫珠琅器物，配以楠木匣，與洋彩瓷器、痕都斯坦玉器、松花石硯等代表清朝盛世功業的文物一起藏於端凝殿中，認證了畫珠琅作為當朝藝術品最高成就的地位。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銅鍍金開光人物像懷表上，表盤中心鐫刻著屬於法國王室的金色百合花標誌，表殼中央的開光處則是路易十四的肖像，打開懷表的外層表盤，一條氣勢威嚴的中式五爪龍赫然出現在機芯保護罩上。此件懷表極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皇帝的禮物，以這種浪漫的方式見證了這段偉大的友誼。萬里之遙，不以為遠。文明之光，相互映照。

17、18世紀以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為中心的跨越百年的對話，迸發出中法兩國交融互鑒的璀璨火花，共同創造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段不朽的佳話。

作者 / 梅嘉妮

本版圖文均據北京《光明日報》